



屈原离骚 简论

逯 欽 立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屈原騷賦簡論

遼欽立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7年 沈阳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篇作家作品論。作者先扼要地論述了愛國主義大詩人屈原的生活道路、思想見解、道德品質與藝術創作，然後就某些重要方面分析了屈原的傑作——離騷。大體是通過離騷的分析了解屈原，又通過詩人屈原的介紹加深讀者對離騷的理解。作者對詩人屈原，對離騷的藝術成就和歷史意義，都作了具體的評價。

屈 原 離 騷 簡 論

遼 欽 立 著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毫米，1/16印張，24頁，37,000字，印數：1—14,131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0090·189 定價(7)0.19元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是一部楚辞的傑出篇章。它艺术地表现了诗人屈原的精神面貌，也曲折地反映了屈原时代新旧社会力量的冲突，即当时的社会真实。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流传对后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由离骚决定了楚辞的艺术水平和传统。我们认为研究诗人屈原或者研究楚辞，应该以离骚的讨论为重点，而解决了离骚本身问题，其他有关的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有了离骚，史传中的屈原就有了生命和光彩。因此，要真正了解屈原，就要细致地、全面地来分析离骚。同样，有了屈原本身的伟大精神与怀抱，才会产生离骚这样优秀的抒情作品。因此，对屈原的生活斗争、思想见解及其所处的时代等，又必须加以深入地研究。

根据笔者的初步探讨，屈原的时代，是法制主张者同反动的封君集团在政治上矛盾冲突的时代。屈原是以一个高洁的、爱国的政治活动家，由于主张法制而同楚国的封君集团展开了政治斗争的。在封君集团的排挤和攻击下，屈原的政治前途是终于断送了，但已有的政治活动及成就，使他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结合起来。他的爱国心是热切的，政治理想是远大的，而

其政治責任感又是极其強烈的。政治上的这种精神与怀抱已經形成一种无法摧毀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决定了詩人写作上的光輝成就。質言之，屈原是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进步人物，参与了这个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斗争，又是在这种斗争中为封君集团所打击而失敗的，詩人的本身及遭遇即是具有典型性的，而离骚則又是通过优美的文学創造表现了詩人的典型化的艺术性格。

因此，离骚所表现的詩人性格不同于一般的爱国人物。他的強烈的爱国思想結合着高洁的修士情操，和进步的法制精神，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一个典型的伟大詩人和政治活动家。簡言之，离骚中的詩人形象可以說是我們民族的高尚、正直、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及疾惡如仇等美德的化身。因此，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这个感人的形象，在永恒地喚醒后代人們的高尚志趣和爱国热情，使人們把屈原当成一个榜样来仿效，从他身上学习对腐朽沒落的統治階級进行堅貞不渝的正义斗争。可以说，屈原成为历代被压迫的詩人文士的旗幟了。离骚的优秀文学艺术，也由于它的光輝形象与进步內容，对后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們都知道，离骚的体裁样式直接作用于汉代辞賦，成为辞賦的先河。实际上，离骚对后代的影响是极其广泛的。它的浪漫主义的表現方法，它的智慧性的語言艺术，它的划时代的新的艺术成就，对于象宋玉、賈誼、張衡、蔡邕、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等大作家的詩賦写作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启迪与影响。离骚的“衣被詞人”才真是並“非一代”的

了。

但是，离骚究竟是怎样写成的，塑造了怎样的具体人物形象，离骚的内容与形式对后代有什么影响和作用等等，都需要我們做詳尽的探討与闡发。現在，初步分下列四項討論上述的問題。这四项是：①屈原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見解；②离骚所塑造的形象及其典型性；③离骚的思想性和艺术特征；④离骚对后代的影响。

屈原是战国中期，即公元前三、四世紀之际的我国伟大詩人。关于他的生年月日，在离骚之中即运用古曆干支作了記錄，所謂“摄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陈騭根据这个記錄，推定屈原生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三四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見所著屈子生卒年月考）。刘师培推算为楚宣王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見所著古曆管窺）。郭沫若先生推算为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三四零年）正月初七日（見所著屈原研究）。浦江清先生則推算为楚威王元年（公元前三三九年）正月十五日（見所著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經過上述学者的推算考証，足以断定屈原生在公元前四世紀，他的生活时代是前三、四世紀之际。而屈原的生年月日的推定，当以浦先生所推定的最为精細。我們可以說，屈原的誕辰是公元前三三九年旧曆正月十五日。

屈原生年月日的推定，在研究屈原生平方面是一項貢獻，

是必須加以肯定的。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屈原之所以要叙述其誕辰，似乎不单单是要說明他的生年月日，而可能有其更深刻的用意。詩人把他的生辰肯定为他的“內美”，並且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句话告訴我們，詩人之所以着重地叙述其生辰，是在表明他的那种擅长天文星曆的家世风范和这个非凡的生辰在他才德成长上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关联到离骚的全面分析，也涉及到作者思想見解的深入研究，是必須加以注意的。

在楚国公族中，屈氏是受封最早、族人最盛、綿世最久的一支，也是能繼承楚族文化传统的一支。楚武王儿子瑕以功封于屈地，瑕的后代遂以屈为氏。这次受封約当公元前八世紀的时候，尙在春秋初期。由春秋至战国，屈氏出的人才很多，如屈完、屈到、屈蕩、屈固、屈廬等，都是著名的人物。战国中期以后，屈氏仍与昭景两氏同为楚国的“甲氏”或“著封”（見庄子庚桑楚篇），一直到西汉初年还是这样的（汉高祖九年，徙貴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但屈原所引以自豪的、所認為最与他的成长有关的，不在于出身于著名一时的屈氏公族，而在于他的家庭真正繼承了楚王族的祖先传统，他的降生日是根据这种祖先传统被認為具有天地之美的誕辰的①。屈原曾自称始祖是顓頊高阳氏。高阳氏曾命重黎氏司天地掌管曆

①高麗：“紛吾既有此內美兮”，王逸注：“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气”。

朱熹注：“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我美質于內也”。

数，战国时期所用的顓頊曆不能說与楚族无关^①。而根据文献記載，司天地掌曆数的重黎正是楚族的祖宗。因此，在楚国，天文星曆之术一定是发达的，楚公族也必然把能够繼承其祖传旧业当做自豪的事情。屈原父亲伯庸显然是拥有和重視这种祖传专业的（否則就不会按曆数为屈原取名字）。以一个擅长祖先天文星曆知識的人物，而那样慎重地察算屈原的生日，並依此决定他的名字，这在屈家当然是一个重大事件。

寅年寅月和寅日的生辰为什么是个美好的生辰？又为什么对屈原的成长会有作用呢？原来战国时代的天文星曆知識是一种科学知識，可也夾杂着迷信的天神思想。星宿迷信思想曾在我国长期地保存着，并且深入人心。如詩經說“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后代如称包拯是文曲星下界等，都是例証。屈原出生的年月日，所謂“摄提貞于孟陬”，这句话指示了岁星（摄提）和太阳同在娵訾宫始点（危宿十六度与室宿一度之間）会合的天文現象，此天文現象便表示是寅年寅月和寅日。根据史記天官書，这颗运行的岁星，当它与太阳同在营室（室宿）五度的时候，营室便被認為是它的清庙或天庙。把岁星当做一位天神，才把营室称做天庙，那么，这位天神是誰呢？史記明明說：“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显然，認為重华就是主宰岁星合辰（岁星合日）的天神了。天神重华蒞临天庙开始宇宙

①唐書历志引大衍曆議：“顓頊曆上元甲寅岁 正月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俱直良維之首。洪范传曰：曆記始于顓頊，上元太始闢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

运行，屈原的降生恰当此时，因此擅长星曆的伯庸，自然把这个寅年寅月和寅日視為一个非凡的誕辰。

其次，屈原誕生的寅日又恰遇到庚寅。据史記楚世家，楚族祖先世掌曆数。帝嚳时代，因为共工事件杀死楚祖先重黎，可是又馬上以重黎之弟吳回繼承祖业。发生这个波折的日子就是庚寅日。史記的这项記載一定有它的历史传说根据。那么，庚寅日对于楚族說来，是楚族敗而复兴的紀念日。屈原的降生，既是在岁星合辰的正年和正月，又是在这样的一个人日子，就会触动屈原家族的天神观念，也必然要按照生辰的祥瑞錫屈原以嘉名。

由此可見，在离騷中，詩人所以一开始就提出他的生辰，不是单纯地記錄其生年月日，而是另有深意的。詩人是在肯定楚族是个世传天文星曆知識的种族，肯定他父亲繼承了这种祖先传统，然后就他父亲的揆度錫名而肯定自己生辰的不凡。是把祖先传统、家世风范和个人生辰統統联系起来，既确定其生辰的先天美，又确定这种先天美和后天“修能”的关系的，是在說明被家族重視的这个生辰从幼年起也对他发生过很大的鼓舞作用的。那么，詩人的一生中，他强烈的上进心，远大的政治理想，兴复楚国的热情和責任感，都与这种鼓舞作用有一定的联系。这就是詩人叙及他的祖先家世生辰名字而充滿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主要原因。天神思想自然是一种迷信，但在当时有此积极作用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也正因如此，星宿观念曾伴随他政治上的挫折而长期地在他的心头矛盾着。在他的远游篇中，詩人曾提出了所謂

“奇傳說之托辰星”。這就是說，托辰星的傳說，得到殷武丁的提拔與信任，而擁有這種內美的自己，却遭到疏遠而喪失了政治前途。奇傳說也正是怪異自己。在涉江篇中，詩人要擺脫世俗，又提出了所謂“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這就是說，自己的誕生是應乎歲星重華的祥瑞的。但人世間既無由實現個人的政治理想，因此要棄世絕俗，到瑤圃與重華同游。而在離騷中，詩人傾吐政治苦悶的時候，所以不朝任何其他神而單獨朝着重華來陳辭，也正是這種原因。當然，在離騷的神游天國的一個場面中（詳後），詩人客觀上已經是否定了所謂神，比着天問的懷疑精神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總上所述，詩人的非凡生辰對他的成長說來，是發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我們應該歷史地認識這個問題。當然，真正決定詩人成長的，主要是他的艱苦的生活道路，他的宏偉的思想見解。

屈原幼年很“貧賤”①，不知從那年起，屈原充當了楚蘭台宮的文學侍臣。他曾經隨同楚王游獵於雲夢之澤，賦詩於洞庭之泉，並在宮庭宴會上為樂舞賦詩作歌②。屈原的這些文學

①九章情語：“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又東方朔七諫寫屈原說：“平生于國兮長于原野”，可見他幼年時期很貧窮並在郢都附近的鄉村居住過。

②文心雕龍時序篇：“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台之宮。鄒子以談天飛辯，……騶爽以雕龍馳响，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據此，楚國筑蘭台宮，意在廣延當時文學之士。劉勰這個說法當是有根據的。又七國考引拾遺記：“楚懷王之時，舉群才賦詩于水湄，故云湘灘洞庭之樂，听者令人忘老，雖咸地靈詔不能比焉”。按招魂：“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王逸注：“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以曾嘗侍從君獵，今乃放逐，數而自傷閔也”。可見屈原曾以侍臣隨同楚王游獵，又招魂：“敝鍾按鼓，造新歌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也是追述懷王生前宴會情況，詩人曾造歌賦詩來配合樂舞。

活动是与侍游作赋的宋玉颇为类似的。据史记本传，屈原是个“嫺于辞令”的人。嫺于辞令，便是善于说辞。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充任文学侍臣的原因。战国以降，各诸侯国的权势扩大，独立性增强。它们的“越礼僭分”不但体现在政治上，而且也体现在一切制度与生活上。因此，这时期的齐楚各国，有一部分为封君们所养的“士”，他们继承着周朝献诗讽谏和春秋赋诗的习惯，在新的现实的需要下，以说辞为统治阶级服务^①。所谓说辞，一般地说，是臣僚以中听的“辞”对君主进行讽谏的“说”（音尸×ㄣ）。说辞有时单称“辞”，如申叔时说要楚庄王，先征求楚王的意见说“犹可辞乎”^②。有时单称作说，如楚顷襄王责成宋玉作辞，就说“有说则止，无说则退”^③。这种说辞在战国时期扩大了用途：有的用于外交折冲或政治活动，如苏秦、张仪用游说进行“合纵”“连横”便是。有的当作一种专门的折辩工具进行谈辩争论，如以辞著称的淳于髡，要设辞击败邹忌，以饮酒的“辞”来讽谏齐王等是。有的则以文字写成的“辞”文学来侍奉君主，如好“辞”的宋玉用“赋”

①例如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等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见史配田敬仲世家）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说明侍臣们並以文学写作服务于封君。

②左传宣公十一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因县陈。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饔之：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寻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汝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这里辞就是辞说之辞。

③见昭明文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来娱乐楚襄王便是。“嫺于辞令”的屈原，正是以“辞”的才能成了楚怀王的文学侍从。毫无疑问，我们决不能把屈、宋的辞赋成就归功于他们的曾为文学侍臣。也就是说不能把文学侍从的职位当做楚辞产生的根本原因。但屈、宋之所以走上写作楚辞的道路，获得写作上的艺术与习惯，又不能不承认同他们的出身于文学侍臣有一定的关联。

习辞善说的士人，在当时往往凭着这种本领致身卿相。邹忌的相齐就是一个显著例子^①。“嫺于辞令”的屈原，在这一点上和他們是一样的。約在楚怀王十五年以前，当楚国任六国縱长与强秦爭勝負的时候，屈原的“明于治乱”由于为楚怀王所重視，而升任到左徒的职位。楚的左徒一职是比较稀有的，后来仅仅有黄歇在楚考烈王时做过这样的官职。屈原从文学侍臣一下子升为左徒，这表明了他被楚怀王信任的程度，他的本身的政治才能。这时，屈原年甫二十六岁，他“入則与王图議国事以出号令，出則接遇宾客应对諸侯”，在內政外交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政治理想和責任感的有力支持，屈原根据现实的需求，仿效祖宗屈到創立法典的精神，进一步在楚怀王的同意下，开始草拟新的法制条文，即本传所謂的

①新序杂事篇：“昔者邹忌以鼓琴見齐宣王，遂为王言琴之象政，状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与語三日，遂拜以为相。齐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說以辞，邹忌不能及，乃相与俱見邹忌”。又战国策：齐策，載邹忌諷齐王納諫一条，亦可見邹忌的等于說辞。以辞致卿相不止邹忌一人。

“造为宪令”①。

上述这些政治活动的成就，使屈原对楚国的命运更加关怀，使他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更加提高。在九章的惜往日一文中，屈原曾经提到他们君臣准备推行法制的情况，诗中这样说：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令，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嫉。

在这些语句中，诗人的心情是何等自豪，诗人的爱国感情是何等强烈。显然，政治上的得志增强了他的爱国思想和法制精神。然而，如果屈原此后一帆风顺或是放弃了他的政治斗争，他就不能够为他的文学创作储备更大的力量，写出象离骚那样伟大的诗篇。换句话说，屈原政治斗争的不断发展与变化，是他诗歌写作上获得杰出成就的重要因素。

楚怀王十五年顷，当屈原得到国王信任的时候，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已经“心害其能”。根据史记本传，靳尚是楚王的亲信，他和子兰等互相勾结，代表着衰朽的封君集团。封君集团是反对法制的，是和主张法制者水火不相容的。屈原得到楚怀王

①屈到的创制法典见国语楚语屈到嗜芰条。九章惜往日说：“奉先功以照下令，明法度之嫌疑。”就是说继承祖先此种业绩来明法审令。又“造为宪令”，就是拟制法制条文。宪令，相当于法制或令典；春秋战国的普通成语。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郑国子大叔曾经提到楚国的宪令。屈原“造为宪令”，当然已经不是楚国原有的法制。“造为宪令”与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都是说新的制作。屈原所拟制的宪令，我们称它是法制条文，还有下列各证据：韩非子定法篇：“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又问辩篇：“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

信任，又要草拟宪令要实施法制，便遭到这个集团的仇恨和反对。史称靳尚窥看到法制草稿，曾駁斥草稿的内容，但屈原不同意靳尚的这种言論^①。靳尚的暗中干涉不成功，便对楚王直接誣蔑屈原在楚国发布号令方面的自伐其功、目无君长。靳尚的这种讒言，竟使楚怀王疏远了屈原。

楚怀王十六年，张仪为秦国进行阴谋活动而到达了楚国。据新序节士篇，张仪抵楚后用重資賄賂了靳尚以至子兰和郑袖，目的是：一方面使他們共譖屈原，从楚国内部瓦解楚齐的“縱亲”关系。另一方面，利用子兰等挂上“献商于之地六百里”的釣餌，誘使楚怀王上鉤，从而导致楚与齐的正式絕交。张仪的阴谋活动完全取得胜利以后，屈原即降职为三閭大夫，楚与齐的縱約也很快解散。身任国家重責的屈原，从疏远中又被貶到微不足道的閑职，他的痛苦和抑郁是可以想象的。后代詩人曾以“屈雄志于咸豎，竟尺土之莫及”，追叹惋惜他的遭遇，可以說深刻地表达出屈原的内心。可是，屈原的政治前途虽然从此完全断送了，而屈原的精神怀抱已是一种无法摧毁的力量。这种力量不能在政治上得到發揮，却在文学創作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楚怀王十七年，怀王为张仪的欺騙行为所激怒，曾起兵伐

^①史記屈賈列傳：“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这里指靳尚，地位又在詩人以上的大夫官。“見而欲夺之”，一般解释是說想攬为己有。这解释，不太通。夺是“定夺”的夺，也是“强辞夺理”的夺。見而欲夺之，是說見了宪令草稿便要胡亂駁斥。不与，便是不答应不同意的意思。

秦。丹阳之役，楚軍全部失敗，八万名甲士被屠杀，大将屈匄、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被俘虏。这次敗仗，动摇了楚軍的軍心，而兵敗地削也使楚怀王感到了恐惧。志昏心蕩的楚怀王，不能从失敗中寻找教訓，刚好相反，他迷信巫鬼，企图用鬼神的威力来抗拒秦軍。于是在郢都东門，建筑一所沉馬祠。年年以白馬沉水，祭祀楚国的河神^①。楚怀王的这种“隆祭祀，事鬼神”，当然不会得到什么天神保佑，可是却掀起当时的巫教热潮，发展了楚国的巫教音乐。这就是所謂“楚之衰也，作为巫音”（見呂氏春秋侈乐篇）。祭鬼神、兴巫音的本身，是楚貴族日趋于沒落的表征。但这种祀礼既然包含着对敌人的詛咒，对胜利的祈祷，在当时来論也很能激起楚国人民的爱国心情。屈原身任三閭大夫，掌管宗庙祭祀，遂在此时写作了以国殇为主九歌。九歌可以說是在巫音熾盛之际的一部优美的祭神詩，它饱和着民間文学色彩和爱国的思想內容。屈原的文学写作便从此正式开始。

从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一三年）到三十年（公元前三九年），这十五年当中，是屈原被疏远的期間。这期間，楚国内政外交陷入动摇不定和节节失敗的情势。楚怀王二十年，楚“合齐而善韓”。二十四年，楚背齐合秦。二十九年，楚又“使太子为質于齐，求与齐合”。这种朝秦暮齐的楚外交，使楚国

①陆机要覽：“楚怀王于国东起沉馬祠，岁沉白馬，名饗楚邦河神，欲崇祭祀拒秦师，卒破其国，天不佑之”。按汉書谷永传亦謂：“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

“兵挫地削”，每况愈下，几乎一蹶不振。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起兵伐楚。二十八年，秦又与齐、韩、魏三国合兵击楚，楚军败于垂沙^①，楚将唐昧被杀。二十九年，秦军伐楚，楚兵阵亡超过两万，楚将景缺被杀。三十年，秦军伐楚，陷楚城八座。同年，武关之会，楚怀王被拘于咸阳。显然，在秦军沉重打击之下，楚已经在内政外交方面失掉了控制力量。楚的“皇舆”的确溜向下坡路了。

约在楚怀王十六年至二十四年间，屈原被疏，“忧心愁悴”，目击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所图画的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曾在悲叹之余，运用连珠发问式的民间文学体裁，写了瑰奇的天问一文。对宇宙人生历史神话等传说提出一系列的疑难问题，表现出诗人探索真理的精神，及诗人忠君爱国和近于发狂的悲愤心情。

楚怀王二十四年，诗人年已三十五岁，他曾经离开郢都远赴汉北。在到达汉北以后，作了九章中的抽思一篇。在行将远离故都的时候，诗人开始了他的巨著——离骚的写作^②。楚怀

①史配六国表，楚怀王二十八年下，“秦韩魏齐败我将军唐昧于垂丘”。据荀子议兵篇，楚国此役败于垂沙。

②离骚：“恐美人之迟暮”，又“老冉冉其将至兮”，可见屈原作离骚时，年纪并不太小。戴震屈原赋注：“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皆过时之慨，即论语所云，四五十而无闻，斯亦不足畏是也。”纪昀修晓岚曰：“美人，以谓盛壮之年耳。”可见戴、纪两人都认为离骚之作在屈原四十岁前。按离骚又说：“及年岁之未衰兮”，“及予觴之方壮兮”，又可证离骚之作在屈原三十岁以后不久。按楚怀王十八年，屈原二十九岁，曾经使于齐国，是时楚又与齐合。至楚怀王二十四年，即屈原三十五岁时，楚又背齐合秦，秦厚赂于楚，楚往秦迎妇。屈原袖后赴汉北，应当在这一年前后。离骚说：“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可见是去郢前后的作品。因此，我们认为离骚是作者三十五岁前后开始写的。

又九章抽思篇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知道是到达汉北以后的作品。

王三十年，屈原重居郢都，已經是四十一岁的人了。这年，秦昭王下書約楚怀王在武关会晤，屈原認定秦是虎狼之国，劝楚怀王不要踐約赴会。可是楚怀王听信了子兰的意見，竟如期与秦昭王相晤，結果得到的是“入秦不反”的下場。楚頃襄王三年，秦把楚怀王的灵柩送付楚国。死了的楚怀王使“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屈原写出了他的招魂，用它招自己和楚怀王的魂。

楚頃襄王元年（公元前二九八年），秦軍出武关，攻伐楚国，斬楚国五万人，陷落析县等十六座大城。汉水上游，包括襄、邓在内的汉北地区遭到秦軍的破坏。当地人民，棄家舍业，沿汉水南下逃亡。恰在此时，屈原的巨著离騷已經在流传。这又惹起子兰等的恼怒，曾假手上官大夫向楚頃襄王进行譏毀。結果，第二年春，四十二岁的詩人从废紉中又被統治者所迁逐了①。仲春甲之日早晨，屈原拋棄閭里，痛心地与故都的国門告别。事有湊巧，詩人在江夏間遇到了东迁的大批难民。詩人的命运是同楚国的兴衰相联系的，詩人的苦痛也是同人民的灾难不可分的。因而这样的同道东迁不能不触动詩人的悲

①屈原的被疏放流，約在楚怀王十五年，即张仪到楚以前不久（見前）。屈原的被迁逐，則約在楚頃襄王元年。史記屈原传，“长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不返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国，繫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怀王之終不悟也。……令尹子兰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迁之”。可見屈原的被棄逐，在楚頃襄王繼位不久，而且还在楚怀王客死秦国（楚頃襄王三年）以前。故假定为在楚頃襄王元年。但屈原被迁离开郢都，約在第二年，即楚頃襄王二年仲春。參看15頁注。